

从传播“唯物史观”到建构“民生史观”

——解析1920年代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态度的转变轨迹

王贵仁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内容摘要】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的态度经历一个变化过程。五四运动前后国民党人“热情传播”唯物史观,20年代中期孙中山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吸收与改造,提出民生史观思想;20年代后期一些国民党人把民生史观思想体系化,并与唯物史观截然分立,全面对抗唯物史观。促使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态度转变的真正原因是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根本原因是受国民党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持的政治立场决定。国民党人在此期间学术思想变化与其现实政治立场紧密相连,是他们的现实政治立场影响了他们的学术思想。

【关键词】唯物史观 国民党人 学术思想与政治立场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09)11-0092-04

国民党人在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在五四运动前后,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的热情可与马克思主义者比肩;在1924年前后,唯物史观基本被认同为国民革命的指导思想,受到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人的高度重视,但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受国民党人的政治立场影响,20年代后期一批国民党理论家试图构建民生史观理论体系,与唯物史观相对抗,国民党人最终与唯物史观分道扬镳。纵观整个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曾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

受多种因素影响,五四时代曾出现“唯物史观热”。国民党人创办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建设》等报刊都对唯物史观进行过大量的介绍、宣传及研究。胡汉民主编的《建设》杂志尤为突出。

《建设》创刊于1919年8月,每月出版一号。从1919年8月第1卷第1号出版,至1920年7月第2卷第6号刊出后中断,《建设》在仅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总共发表各类文章有110多篇,其中涉及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宣传的文章(包括译文)约20余篇(次),占该杂志全部篇(次)的20%左右,从刊载的比例与份量看,超过同一时期的《新青年》。

在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介绍。戴季陶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以及苏中翻译日本学者河上肇撰写的《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摘录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唯物史观的段落;苏中翻译发表的

《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摘译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编第2、3章有关唯物史观的思想;胡汉民的长篇论文《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摘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八本著作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精辟言论。这八本著作是《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哲学的贫困》以及《神圣家族》、《法兰西内战》、《〈资本论〉第一卷附注》、《资本论》第三卷。除此之外,胡汉民还引述了恩格斯1889年致布洛赫、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对唯物史观原理解释说明的通信等。

国民党理论家高度评价唯物史观的学术与社会价值。胡汉民说,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只有“到马克思才努力发明人类历史的进步的原因。以为人类因社会生产力而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定法律上政治上的关系,更左右其社会个人的思想感情意见,其间社会一切形式的变化都属于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此立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所以创设这个学说的名誉究竟归于马克思和他友人恩格斯。”^[1]胡汉民称唯物史观“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了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2]。林云陔称“马克思是最真实的哲学家”,“马克思因格(笔者注:恩格斯)的理论,本来早已被人承认了做‘科学的历史’的原料,他在19世纪时就早已大功告竣了。”^[3]

唯物史观在戴季陶、胡汉民等人那里,最初主要是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被运用于分析与

* 作者简介:王贵仁,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博士。

考察当时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和研究中国的历史等政治与学术活动中。戴季陶先后撰写了《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革命！何故？为何？》、《到湖州后的感想》等文，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问题。戴季陶认为“社会生活问题”是社会的根底，分析问题不应只从表面上考察，而应从“社会生活问题”入手。他说“无论一个甚么问题，没有不和‘生活’有关系的”。因此分析任何社会现象，都要从“社会生活问题”入手，这是“在他的根底上”的因素。戴季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发现那一种很深邃地‘唯物史观’”是“精确的学理”^[9]声明“我是赞同唯物史观的”^[6]。

胡汉民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家族、妇女解放、伦理道德等问题，并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些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领域发生了变动。胡汉民在《建设》上发表长篇文章《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并宣称“我这篇文章，是拿唯物史观应用到中国哲学史上”^[5]。戴季陶忆及他与胡汉民探讨唯物史观的情形时说：“展堂说，‘我以为中国一切思想的变迁并不是甚么精神生活的影响，都是经济生活的影响’”。周秦诸子各种学说发生的基本原因，都归之于“井田制的破坏”。“我听了这个话，欢喜得了不得，很希望这个‘中国史之唯物史观的研究’能够得一般学家的注意和协作，便是思想大解放了。”^[6]

五四时代国民党理论家热衷唯物史观，是当时“唯物史观热”的重要表现。探究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蓬勃发展及中国社会形势变化的大环境影响；另一方面是国民党人在革命屡屡挫败后，积极探寻新的革命道路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胡汉民、戴季陶等人对唯物史观的探讨与李达等人是根本不同的，他们主要是从唯物史观理论中寻找一些有助于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概念工具，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力求从中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从根本上寻找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戴季陶曾说“执信先生（朱执信）是尼采和马克斯的合成人格，汉俊（李汉俊）是马克思主义者，展堂先生（胡汉民）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只可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者罢”^[6]。戴季陶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几个人的真实情况。

胡汉民、戴季陶等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从“经济”视角切入的，他们接受的唯物史观是“经济的历史观”，是“社会问题的经济分析”。他们不关心唯物史观中的“政治理论”，即不热衷唯物史观之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们没有涉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他们不可能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胡汉民等担心甚至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之路。胡汉民在《建设》上发表的《孟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曾明确指出，“拿欧洲近代社会主义的主张（指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戴季陶也认为“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俄国）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7]。可见，他们对待唯物史观的这些态度，同他们当时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

二

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指导思想，经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和推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国民党人也认识到唯物史观的革命价值。戴季陶说，马克思唯物史

观的价值就在它具有革命性，“应用唯物史观，说明社会革命，很容易使劳动阶级的人，生出革命的觉悟来。所以唯物史观是否真理，乃是另一问题，但是在应用的上面，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哲学的地位，是因为他思想的自身，具备丰富的革命性。”^[8]（P55）

孙中山称赞马克思研究历史“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疑”。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方法”。孙中山认为，马克思“在这种历史中所发明的最重要之一点，就是说世界一切历史都是集中于物质，物质有变动，世界也随之变动。并说人类行为都是由物质的境遇所决定，故人类文明史，只可说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马克思的这种发明，有人比之牛顿发明天文学之重心学说一样。现在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因为他的研究透彻，理由充足”，所以人们都“信仰他”^[9]（P772-774）。孙中山充分肯定唯物史观价值，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高超的、脱离实际的理论，而马克思从社会事实与历史方面研究，“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学问经验，对于这些问题作一种极透彻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不能解决的都通通发明出来。他的发明是全凭着经济原理”^[9]（P772），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9]（P773）。

但是，孙中山把唯物史观归结为“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表明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肤浅的。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孙中山提出了对唯物史观的批评。他说，“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这种发明就是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9]（P775）。虽然孙中山对唯物史观有误解，但他认识到历史的主体即人是历史的重心，历史的发展的重要原因不是物质发展，而是人类求生存活动的需要。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是历史的重心，人及其生存活动在历史中的居于核心地位。孙中山这一观点，在当时的理论界是卓越的。

孙中山批评唯物史观并不是反对唯物史观，相反他一再宣称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但孙中山并不愿意把国民革命的指导思想统一在唯物史观之下，立足三民主义立场，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过去的理论，与当今现实不符，也不适合时下中国革命的发展需要，因此他试图用“民生主义”整合和改造唯物史观。提出“民生”是历史的重心。他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10]（P802）。

孙中山提出“民生”是历史重心，他认为“民生”是社会进化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孙中山强调说，“民生就是政治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从前的社会主义，错认物质是历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种种纷乱”。“我们现在要解除社会问题中的纷乱，便要改正这种错误，再不可说物质问题是历史中的中心，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9]（P787）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在基本精神上是有相近之处的。孙中山从人的物质经济生活出发考察历史，有助

于克服当时学者把唯物史观归结抽象的“经济决定论”的片面性。但民生史观强调的生活是人的生命体的生存,它强调的是人是孤立的、个体的人,不是群体的、历史的、社会的人。从这一方面来说,孙中山走入了另一种片面与抽象。

在唯物史观迅速传播,其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对中国国民革命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孙中山接触到唯物史观,并受唯物史观影响,在肯定唯物史观的前提下,提出民生史观思想。孙中山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是诚恳的,他对唯物史观的批评是出于建立国民党人的革命理论基础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社会问题的需要,并不包含反对共产党的意义。在国共合作初期,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和唯物史观的理论。孙中山民生史观借鉴并体现了一些唯物史观思想,对唯物史观有批评但不拒绝,有矛盾但不对抗。这充分表现了他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治立场同他的学术观点的一致性。毛泽东曾中肯地评价说“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问题,但在20世纪20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的一致性的结论”^{[11]P1472}。

三

1925年孙中山逝世,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内的斗争加剧,一些国民党人对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影响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等革命形势,感到忧虑与恐慌,提出要“清党”“护党”。

一些国民党人开始建构“民生史观”思想体系,用它与唯物史观争夺国民革命指导思想。国民党理论家张太风后来回顾说:“在本党出师北伐前后,军事势力达到长江流域之时,反对三民主义的人,直指三民主义没有哲学根据,意图贬低其价值,正是今日局踞一隅,大唱马列主义中国化者流所提出,这种谬论至今犹存,这是革命理论斗争的开始,也是三民主义理论发展的开始,在不断的斗争中建立起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12]P18}。童行白也说:“自发现共党破坏国民革命的阴谋以后,遂有清党护党之举,因清党而注意理论的分析,因护党而从事主义的阐扬;如胡汉民同志的连环性,周佛海同志的体系说等,均为名贵之作。”^{[13]P29}

从孙中山逝世至40年代止,国民党出版了一大批民生史观研究著作与论文,如: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梅思平的《民生史观概论》、童行白的《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析论》、萨孟武的《民生史观》、叶青的《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吴曼君的《民生史观研究》、缪风林的《史观·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和张太风的《民生史观大纲》等。国民党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国民党本身的历史观,以便与唯物史观相抗衡。

国民党人首先极力抬高“民生史观”的地位,认为它是对唯物史观的超越和深化,从而劝导人们信奉民生史观,并以民生史观取代唯物史观理论地位。1925年戴季陶就指出:“先生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是相关联的,不是相对立的。我常说:‘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研究两先生的思想,可以说,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用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可以更证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正确,而不能减少中山先生思想的价值。’”戴季陶说,民生哲学比唯物史观更全面,使用范围更广。唯物

史观只能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但是民生哲学却能把一切革命历史解释清楚。“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14]P105}。

国民党人努力建构完善的民生史观思想体系。梅思平说:“民生哲学系统的解释,在今日尤觉得是非常的迫切。共产党们的理论,现在表面上的系统,已经是装饰得很好了。他们的中心理论现在都是建筑在唯物史观上面。由唯物史观从下推,则可得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结论。由唯物史观从上报,则又可得有近代科学作后盾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现在是以唯物论作掩护,是藏在唯物论后面与一切社会学说相作战。凡反对唯物史观的,他们都加他一个唯心论或二元论的罪名。……现在我们三民主义者最重要的工作,第一步就是把三民主义站在民生史观的立足点上;第二步就是把民生史观找出一个形而上的出发点。然后民生哲学全体才有一个有条不紊的系统,而可以把共产党的理论根本扫除出去。”^[15]

为此,戴季陶把民生史观与传统思想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是民生史观思想的来源。他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16]他的“民生史观”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传统“民生”哲学思想,而不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想,更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戴季陶强调“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他把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物质成份抽去,而注入主观唯心主义成份。在他看来,人类求生存的冲动和欲望,乃是决定人们求生存的活动以及一切历史活动的根源。他说“社会文化越是进步,人类的关系越是复杂,由生存欲望派生出的欲望差异,也越繁多而明显……欲望的内含都是能生、所生的根源”^[17]。显然,历史发展的根源不是物质的、经济的原因,而是人的生存“冲动与欲望”,是这种“欲望”决定着人类历史的进步与发展,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根源。

戴季陶搬出中国古代的“仁爱”学说,以“仁爱”作为孙中山“互助”的理论基础,反对阶级斗争。戴季陶强调说“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的基础”,“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是人类的本性”。“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他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既然仁爱是人类的本性,那么“阶级的差别,并不是绝对能够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那些不来革命的人,只是不知,如果是能知,他的仁爱性依然是能够发现,依然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他呼吁“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了他的兽性,恢复他的人性”。他攻击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16]。

周佛海在戴季陶民生史观体系提出的同时,也提出自己关于民生史观的体系说。童行白转述周佛海的思想时指出:“思想无论什么人都是有的。不过要在历史上占位置,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思想,一定要有统系,而有统系的思想,一定是从三部分成立的,一是对于过去的解释,二是对于现在的批评,三是对于将来的理想。从对于过去的解释,生出对于现在的批评,再从对于现在的批评,产出对于将来的理

想。所以我们要知道先生思想的全体,须看他对于过去的解释如何?对于现在的批评怎样?对于将来的理想及实现理想的手段如何?”周佛海在他的《中山先生思想概要》一文中,阐述了孙中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想,提出了关于民生史观的理论体系^{[15][P107 P114]}。周佛海的思想马上被许多国民党人所接受。童行白不仅称赞他的学说是“名贵之作”,而且运用它来阐述自己的主张。陈立夫在他的《唯生论》的序言中也强调要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连在一起进行科学地研究。在周佛海理论的影响下,对孙中山思想体系的论述和研究几乎形成了一种模式。许多有关的著作都分为三个部分,对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统一的认识。萨孟武不仅把历史观作为他阐述孙中山思想的出发点,而且也像童行白等人一样,强调现实社会的发展是由历史所决定的。

在孙中山逝世后,一批国民党人企图通过建立“民生史观”哲学体系,作为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以便与唯物史观相对抗,夺取对国民革命指导思想的主导权。他们把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完全割裂,甚至不惜抽出民生史观的有关唯物成份,把民生史观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仁爱”哲学之上,与唯物史观形成根本对立局面。共产党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周恩来等人针对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态度的转变,尤其是把民生史观置于唯物史观的对立面,对抗唯物史观的理论,给予了积极地回击和坚决地批判。但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形成不相容的、对抗的关系已是不争的事实,双方的斗争成为20年代后期彼此关系的主题。当时有人曾这样评价说“民生史观一词是近20年来由国人根据中山先生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立的”^{[18][P2]}、“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已成为近代社会学者争论之焦点”^{[19][P1]}。

20年代后期,国民党人建构起与唯物史观截然分立的民生史观思想体系,这就意味着国共两党在革命理论基础已经分道扬镳,国民党人基于其基本的政治立场放弃了对唯物史观的认同,从而动摇了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国民党和共产党由合作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 [1]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J].建设,第一卷第5号,1919(12).
- [2]林云陔.唯物史观的解释[J].星期评论(纪念号),1919(10.10).
- [3]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J].建设,第1卷第2号,1919(9.1).
- [4]戴季陶.致陈竞存论革命书[J].建设,第2卷第1号,1920年1月13日。
- [5]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J].建设,第1卷第3、4号,1919(10.1,11.1).
- [6]戴季陶译.资本论解说(序)[A].资本论解说[M].上海民智书局,1927.
- [7]戴季陶.对付布色维克的方法[J].星期评论,第3号,1919(6.22).
- [8]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M].上海民智书局,1925.
- [9]孙中山.孙中山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10]孙中山.孙中山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张太凤.三民主义哲学[M].新潮出版社,1943.
- [13]童行白.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析论[M].上海南华图书局,1929.
- [14]陆友白.孙文主义讨论集[M].卿云图书公司,1927.
- [15]梅思平.民生史观概论[J].新生命,第1卷第5期.
- [16]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M].上海民智书局排印本,1927.
- [17]胡汉民.三民主义的心物观[J].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4期.
- [18]范任宇.民生史观[M].商务印书馆,1946(12).
- [19]文公直.民生史观之研究[M].上海新光书店,1929.

(上接第91页)纬的态度和掌握讖纬之学的水平高下,至此已完全成了考察其是否忠诚朝廷、拥护国策的政治标准,成了衡量其思维能力、学术水平的主要尺度,成了决定其在仕途上是加官进爵抑或遭贬废置的重要因素。讖纬之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的确巨大,令人窒息。”^[7]

四、讖纬学说在东汉后期的衰落

从历史上看,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物极必反,讖纬学说也是这样。东汉晚期后,讖纬风行的恶果越来越明显,其危害性也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清醒认识,社会上对它的批判否定之声也开始逐渐加大。如著名思想家、科学家张衡就曾尖锐指出其讖纬学说的荒谬之处“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他大声疾呼:“宜收藏图讖,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则利用“汉行已尽,黄天当立”的预言,将讖纬作为推翻东汉皇朝政权的旗帜。经过东汉末年的动荡,后世的统治者不再对讖纬神学予以重视。讖纬在魏晋后日渐衰落,刘宋后讖纬之书亦受到历朝查禁,隋唐之后,专门的纬书散佚,讖纬作为一种与社会现实和政治紧密结合的神秘学说几近绝迹。

参考文献:

- [1]汪子卿撰,周郢校证.泰山志校证[M].黄山书社,2006.
- [2]班固.汉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 [3]范晔.后汉书·祭祀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 [4]萧统.文选·李善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 [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卷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 [6]刘师培.刘师培全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481.
- [7]黄朴民.两汉讖纬简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41.